

博物館、人類學與台灣原住民展示¹

—歷史過程中文化再現場域的轉形變化

收稿日期：2007年03月26日

接受日期：2007年06月27日

胡家瑜*

摘要

本文主要從博物館人類學的角度，探討台灣原住民相關展示的發展變化，並由此探索標本採集、人類學知識生產、和展示再現的複雜互動過程。文中將台灣原住民展示大致分為五個不同階段，分析各階段代表性博物館或類博物館機構展示特性和動力的差異。首先，是早期外來者好奇觀異的零星呈現，以及19世紀中葉以後「好奇心陳列室」(cabinet of curiosities)的出現。1895年日本取得臺灣之後，人類學者展開實地踏查、族群分類和大規模標本採集行動，形成了科學性展示的基礎。同時，原住民展示逐漸成為殖民統治者運用的管道，對比呈現原始和文明進化發展的概念。1930年代以後，學術取向的展示，逐漸在人類學研究機構中定型，例如台北帝國大學『土俗人種學講座』設置的標本陳列室，以及台灣光復後中央研究院設立的民族學研究所標本陳列室等，這些展示大都與學術研究密切結合。1980年代起，隨著台灣的經濟發展和政治鬆綁，原住民文化展示在多種不同型態的博物館或文化村內成為熱門主題；最近10年間，大量成立的部落文物館或文化館，更成為政經資源競爭和自我意識建構的場所。本文透過檢視不同階段原住民展示的發展變化，試圖進一步思考文化展示再現的意義，以及其中反映的社會脈絡和權力關係。

關鍵詞：再現場域，文化再現，博物館人類學，類博物館機構，展示叢集，具體化，文化賦權

*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。

¹ 本文初稿發表於2006年12月17日日本北海道大學「先住民と大學-台灣先住民との對話」研討會，會中對話人和提問者的許多寶貴建議，對本文的修改提供很多幫助；此外，二位匿名審查人的問題和意見，也有助於釐清本文的一些盲點和疏漏，在此一併致謝。